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徐坚
编著

——历史大视野下的战略机遇期

文明的 再造与复兴



人民出版社

文明的 再造与复兴

——历史大视野下的战略机遇期

徐坚 编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再造与复兴：历史大视野下的战略机遇期/徐坚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

ISBN 978 - 7 - 01 - 016155 - 6

I. ①文… II. ①徐…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506 号

文明的再造与复兴——历史大视野下的战略机遇期

WENMING DE ZAIZAO YU FUXING——LISHI DASHIYE XIA DE ZHANLÜE JIYUQI

徐坚 编著

责任编辑：曹 利

封面设计：九 五

出版发行：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30.25

字 数：430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01 - 016155 - 6

定 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前 言

本书是汇集整理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 10 年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新变化研究”有关成果的结晶。由于该课题涉猎的问题十分广泛且深刻,在此有必要将本书的思路和梗概作简要介绍和梳理,以便读者更好地把握书中的主要观点及其内在联系。

本书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再认识,从分析世界不同文明的兴衰规律展开。我们相信,只有从历史大视野观察,才能将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兴衰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方文明兴衰遵循的规律基本相同,皆取决于它们的自我更新活力和适应外界变化的自我调整能力。西方文明在中世纪后半期复兴、在近代崛起并在世界占据主导性地位,是彻底摆脱了欧洲古典文明束缚后诞生的新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激烈碰撞过程中,如饥似渴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浴火重生,全面再造的结果。阿拉伯文明则在近东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融中再造并崛起,对中世纪前半期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反映的也是这样一个文明再造的过程。1840 年至今,中华文明亦一直处于打破旧束缚、持续再造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更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度继续中华文明的再造,这将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历史必然。历史证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只有文明的再造,才有文明的复兴。东西方文明的复兴都不是原有文明的翻版,而是通过再

造而生的新型文明。文明的再造是一个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包含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必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营养,又必须汲取外来文化的活力。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本质上是文明再造和复兴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从历史大视野出发对我国战略机遇期作出的新定性,也是本书以“文明的再造与复兴”为题的寓意所在。

文明的再造与复兴的历史经验,不仅揭示出文明的兴衰规律,从中也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期的形成规律。我们认为,战略机遇期是指一个国家可以利用的主客观因素共同创造的环境和条件,使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处于一个可以预期的持续上升时期。其形成需满足三个条件:客观环境是否有利于强劲发展潜力的形成;主观上是否具备洞察时机、捕获时机以及运用有利条件扩大机遇乃至塑造机遇的能力和意志;预期可以实现的发展潜力是否有可能超过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本书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后,武力征服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机遇的形成和利用意义明显降低,战争不再是伴随大国兴衰的必然特征。

本书论述的另一个重点,涉及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调整重构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同步发生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影响。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的调整期、国际体系的重构期、全球地缘战略的整合期交织重叠,国际环境进入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时期。2020年前,世界经济仍将处于复杂的再平衡过程,发展呈现亚健康与弱增长的“新常态”,分化发展成为主要趋势,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由“双速复苏”向“双引擎扩张”转变。“东升西降”趋缓,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曲折性、复杂性进一步显现。大国竞争加剧,规则与秩序制定变成焦点。全球性问题易发多发,也成为国际体系转型重构的重要背景,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中国被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逐渐从一个区域性的国际行为体变为一个全球行为体,从更多关注与自身相关的地区形势到必须更多关注全球性问题,从侧重关注区域秩序到必须更多地关注世

界秩序。在战略领域,亚太、欧洲和中东是全球地缘安全形势的三大核心区。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国际政治重心向亚太东移,加上日本政坛右倾化和东亚岛礁争议,东亚政治安全形势暗流涌动,中国周边战略压力加大。与此同时,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以新科技革命为引领的全球产业变革持续推进,区域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同时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和重大机遇。就挑战而言,中国发展转型任务沉重。一是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既要转方式调结构,又要稳增长保发展。二是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转型升级缓慢、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结构性问题日益显露,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等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短板。三是内需市场迟迟未能充分释放。四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更加紧迫。从外部挑战看,发达国家主导并推动的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变局,易成为边缘化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规则壁垒和制度屏障。在此背景下,防止在全球规则变局中被边缘化,避免大国竞争导致大国冲突、对抗,成为我国发展战略面临的大问题。就机遇而言,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产业配套能力不断提升;国民储蓄率显著高于世界上多数国家;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获得更多技术溢出效应;“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赢得更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此外,新科技革命、全球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国产业高端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和韧性,完全有条件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如何转型升级,本书从新科技革命、全球产业变革、体制改革创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引导区域合作、综合能源安全、外交战略转型等方面,进行多方位宽视角探讨,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创新的想法和建议。

由于国内外环境同时出现新常态,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从相对稳定

型、自发型向相对脆弱型、更加依赖主动塑造能力方向转变,从粗放发展方式下的规模扩张维度向发展转型形成的质量提升维度转移,维护和使用中国战略机遇期产生的经济社会成本将显著增高。不过,在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常态的过程中,我国对战略机遇期的驾驭正进入更高境界,加上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内外存在的诸多有利条件,我国依然有较大空间延续、更新和主动塑造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吸取中外运用战略机遇期的经验和教训。历史经验表明,创造和捕捉战略机遇期要有战略耐心和定力;要善择为与不为、争与不争,避免与守成大国陷入对抗;要分散压力,顺势而为,避免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大国之间要避免战略意外的冲击,建立有效的危机、风险管控机制;要争取构建一种有助于良性互动、具有弹性而非敌对、僵化的国际体系;要借鉴均势外交和“离岸制衡者”角色经验,发挥“善意制衡者”作用。

针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行为方式面临的调整或转型,本书重点就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积极引导区域合作与重构区域关系、创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方式等问题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在理论认识上超越西方现实主义理论预设的“唯实力论陷阱”、“唯利益论陷阱”与“零和逻辑陷阱”,在政策实践上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美关系的大方向,抓住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机遇,通过立标和固本推动中美关系迈上新台阶。周边是中国的战略依托地带,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注定要与邻国建立新关系。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机制是中国构建周边关系和秩序的重要内容。鉴于弥合东北亚的区域分裂、战略纷争和政治矛盾需要更长时间,新旧地区安全架构会长期共存,处理新旧地区安全架构的关系不容回避。要使二者相互包容、适应、补充,而不是相互对立、排斥,就要多管齐下,将安全秩序构建与命运共同体建设融为一体,走出符合地区复杂利益关系的特色之路。发展中国家是中国把握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支点。在新形势下,中国亟待创新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式:实行更加清晰的区别战略,不仅要细化区域战略,更要建立意愿联盟;要综合利用不同层次合作机制,以及中国与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论坛,并发挥主导作用;要发挥“一带一

路”战略的联通作用,利用和创新现有双边、多边机制,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创造新方式,注入新动力。

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全球公域”议题,涉及中国战略纵深的拓展,在当前及未来 10—20 年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深远,因而也是本书涉猎的重要领域之一。本书认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在维权与维稳问题上面临两难选择,东海、南海的海上维权已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外交及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问题;第二,中国海空军战力提升,中美关于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的分歧引起美国担忧,为防范中国挑战,美国一面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一面限制中国在海洋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第三,面对海洋秩序重塑中的抉择,由于岛礁与海洋权益争端涉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处理涉海问题中,中国亟须找到一条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两个规则的适当途径。尽管现有海洋秩序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不应作为革命者“另起炉灶”,而应作为参与者发挥建设性作用,逐步对其完善。太空将是未来真正的军事“制高点”。太空时代的历史表明,太空技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军事实力的倍增器、军事和安全战略的赋能器,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展示。但要解决太空公域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合作。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共同探索利用外空及应对外空挑战已成为国际共识,外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亦得到广泛认同。我国正处于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转变的过程,各方对我国在外空领域的期待和借重上升。对此,我国既应充分利用太空技术和资源为推动经济发展升级转型服务,也要积极参与外空领域规则制定。近年来,网络空间成为国际博弈新高地。中国已成为一个网络大国,但不是网络强国,尚未制定自己的“网络空间战略”,属于诸大国中的“后进”,尽早确定中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及议程已成为战略必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安全与治理将是中国网络空间战略议程的三大支柱和三大重点。

探索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是中国发展面对的又一重大使命。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过,近代以来,与在世界居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虽是文化大国,但还算不上文化强国。中国的现代化事

业和民族复兴,需要探索一条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一种文化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文化的时代性。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始终是围绕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展开的。只有把时代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起来,将本土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融会贯通,才能使中国文化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对古今中外文化精粹兼收并蓄,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当前中国文化生态格局中,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总体处于比较好的状态,但也面临在中外文化之间搞门户对立等问题。我们认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应集时代性、民族性、包容性于一体。时代性要反映国内外发展潮流的客观要求,民族性要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而非是否来自本土为依归,包容性要有助于吸纳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共性,体现关切人类共同利益的开放胸襟。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直接关系中国的软实力。目前,我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远不能满足中国对外交往的需要和国际社会期待。从未来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方向是:倡导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想和新理念;积极为设置国际议程出力;在建立国际机制、规范和秩序方面主动发挥引领作用。中国还应该更加重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智慧,通过形成共同观念、集体共识和集体认同来缓解外界的疑虑。

本课题是一项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工程,涵盖影响战略机遇期的各类基础性重大问题,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科技、文化、社会等广泛领域,以及太空、极地、网络安全等全球公域问题。完成这样的综合性研究工程,完全仰赖参与本书写作、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奉献。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本书不同于论文集,在撰写过程中采取共同讨论、整体规划、明确分工、相互协作原则,力争使各学科、各领域的分析和论证既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体现跨学科研究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集成优势。本书各章由首席专家依据课题规划统稿,对所有稿件均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动,以求全书在内容和文字上的协调统一。因水平有限,对涉猎如此广泛的课题进行通稿,偏颇和局限在所难

免,对可能出现的有关问题,首席专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同时,我们欢迎对本书观点持不同意见的读者提出善意的批评和指正。

课题进程在不同阶段承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研究员、张宇燕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研究员,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王逸舟教授、关贵海教授、王新生教授,国防大学江凌飞教授、唐永胜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韩保江教授,南京大学朱锋教授,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研究员,清华大学孙哲教授、邝梅教授等知名学者的智力支持,不胜感激!还有许多中外学者也对推进本课题提供了助益,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谨容在此由衷致谢。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高彦斌同志为本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热忱帮助,特表谢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扈大威、王强、魏永升等同志在行政方面给予诸多帮助;课题组成员朱中博副研究员在课题的文稿收集、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上述同志的辛勤工作与敬业精神,本课题的进展不会如此顺利,在此特表嘉许。人民出版社曹利同志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特予感谢。最后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本课题的全程指导、监督和大力资助为本书的最终付梓提供了强劲动力和保障,课题组全体同仁对此谨表敬意!

课题组首席专家 徐 坚

2016年2月15日谨绪于北京香留园

前 言	1
-----------	---

第一篇 战略机遇期的再认识问题

第一章 文明的再造与复兴——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启示	2
第二章 战略机遇期的新变化	28
第三章 中外运用战略机遇期的经验教训	45

第二篇 国际权势重构背景下的中国外部环境

第四章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格局 的影响	66
第五章 新科技革命带给各国的机遇与挑战	94
第六章 全球性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113
第七章 国际能源变化形势与中国面临的综合能源安全 问题	132

第三篇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面临的挑战与历史性机遇

第八章 国内压力倒逼中国发展方式转型	170
第九章 世界经济新格局与全球化新趋势推动中国发展 方式转型	192
第十章 中国经济社会打造升级版具有坚实基础	212
第十一章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问题	232

第四篇 中国对外关系调整与国际行为方式转型

第十二章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54
第十三章	参与区域合作与重构区域关系	268
第十四章	创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方式	297

第五篇 拓展中国的战略纵深：“全球公域”的机遇共享

第十五章	海洋开发利用与权益维护	328
第十六章	太空利用与规则制定	359
第十七章	发展、安全与治理：中国网络空间战略议程	377

第六篇 文化强国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第十八章	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422
第十九章	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	448
后 记		468



第一篇

战略机遇期的再认识问题

第一章 文明的再造与复兴

——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启示

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 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在十八大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三件大事都向世界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正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崛起,世界格局处于历史性变化时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概念,“世界时间”的钟摆摆向哪里,就代表那里的国家走向兴盛;反之,钟摆偏离的国家和地区则走向停滞或衰落。^①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崛起使“世界时间”的钟摆由西向东回摆。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以及东西方文明发展趋势的影响成为世界热议话题。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用“大分流”^②一词来描述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中国崛起是否意味着东西方文明正在出现又一次“分流”? 中国将如何崛起、能持续多久? 中美能否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冲突? 围绕这些问题,国内外众说纷纭,各种争议持续不断。美国学者沈大伟提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崛起不能持续。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不会衰落。中国学者季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2—3 页。

②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羨林提出东西方文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许多观点听起来不无道理，也不无局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如果相信历史发展存在规律，要摆脱各种争议带来的困惑，为我们预测未来的有关问题找到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有必要带着当前的争论去回溯历史，从起点梳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从历史的形态中去寻找启示或答案。

一、东西方文明从交相辉映到第一次“分流”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文明，其数量多到几十种，少到几种，取决于用什么方式界定与划分文明。^① 不过，无论是就其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力来看，还是就其对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的意义来看，东西方文明无疑在人类各种文明中最具代表性。

人类史前时代无所谓东方和西方。现代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现在的欧洲人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我们中国人也不是北京猿人的后代。按当今世界主流看法，我们现在的地球人都是非洲人，都是6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② 东西之始发生在冰河时期末期，即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世界文明核心区相继出现后。最早的文明核心区发源于跨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约旦河谷的侧翼丘陵弧形带，然后向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拓展，继而经西奈半岛向尼罗河流域发展，此后扩展到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半岛等地区。发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则是世界文明的另一个核心区。

^① 关于不同文明划分的介绍，参见[英]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XXXV页。

^② 有关东西方人类起源的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研究最新成果，参见[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衰落，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章。有些中国考古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坚持人类多区域分别进化理论，认为现代中国人类发源自现在中国所在的区域，而不是非洲。但对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这无关宏旨。

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人们通常的观念认为,西方文明系指欧洲,东方文明系指亚洲。但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吕思勉^①指出,从东西方文明演进历史看,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河川、湖泊,本不足为地理上的界线,乌拉(尔)山虽长而甚低,高加索山虽峻而甚短。”他认为,“历史上东西洋的界限,是亚洲中央的葱岭,而不是欧亚两洲的界线。葱岭以东的国家和葱岭以西的国家,在历史上俨然成为两个集团;而中国则是历史上东洋的主人翁。”^②这种看法与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莫里斯,“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的核心地带扩张,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也是很久以前,东方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③。莫里斯将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视为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文明相互之间很久以前就呈现出深刻的承继、冲突与交融的趋势。例如,印度文明核心区尽管距地中海遥远,但早在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就远征到了恒河平原,进入旁遮普一带。阿拉伯裔美籍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由一条溪水养育起来的,这条溪水发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这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东。在后面我们就要看到,这条同一的溪水,怎样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欧洲,而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助力”。“伊斯兰教因此在此联系那条南欧和近东的中世纪文化纽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至于印度文化,则是伊斯兰文明在哲学、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另一个“早期启发源

① 吕思勉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列民国时期“史学四大家”。

② 吕思勉:《每天学点中国史》网络版。吕思勉在其他著述中亦有同样观点,参见《吕思勉文集》(第四卷),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956页。

③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衰落,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XXXII-XXXIII页。

泉”，“欧洲人所谓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所谓的印度码子”，都是从印度传入。“九世纪时，印度人对于阿拉伯数学又作出了另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十进位法。”^①中外历史学家对东西方文明的上述界分，皆反映自然地理状态对历史上不同文明相互交往关系的重要意义，说明地理因素对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近代以前，由中国西部的葱岭和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西北的阿尔泰山脉和昆仑山脉，东北的内外兴安岭，以及东面的大海所构筑的天然屏障，对中国文明与外界交往有巨大阻隔作用。而这种作用对揭示东西方文明演进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文明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始至终都处于几个不同核心区的相互激烈碰撞和深度交融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欧洲文明并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种继发型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其他文明核心区移植而来，同时也将欧洲文明传入其他核心区。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时，部分叛乱士兵留了下来，在现在的阿富汗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150年，巴克特里亚王国征服了恒河平原，融合了印度和希腊文化。印度史书记载了一个佛教和尚与讲希腊语的巴克特里亚国王之间的对话。^②考古发现，公元前200年就有货物从地中海运抵印度的阿里卡梅度和其他几个港口，且数量在之后的三个世纪中不断增加。罗马帝国在其巅峰时期，不仅将地中海变成其内湖，甚至远征至印度。进入中世纪后，欧洲基督文明继续与传播到北非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文明在对抗、冲突中交融，从十字军东征一直持续到近代欧洲列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

在自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恰好相反，属于一种原生型文明，近代以前基本处于相对独立的演进状态，与其他文明核心区

①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引自上卷，第278—279页。

②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衰落，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